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
湖南省2008年度重点图书出版项目

湖南崛起之路研究丛书

陈晓红 主编

湖南

浙江发展之路

与

湖南崛起

李康祥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
湖南省2008年度重点图书出版项目

湖南崛起之路研究丛书

陈晓红 主编



浙江发展之路 与 湖南崛起

李康祥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江发展之路与湖南崛起 / 李康祥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81081 - 984 - 8

I. 浙… II. 李… III. ①地区经济—经济发展—对比研究—浙江省、湖南省②社会发展—对比研究—浙江省、湖南省 IV. 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0874 号

浙江发展之路与湖南崛起

李康祥 著

◇策划组稿: 黄道见

◇责任编辑: 颜李朝

◇责任校对: 蒋旭东 胡晓军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 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30 × 960 1/16

◇印张: 13.5

◇字数: 169 千字

◇版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81081 - 984 - 8

◇定价: 38.00 元

序言

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 梅克保

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继作出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后，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中部地区加快发展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

作为中部重要省份的湖南，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建设和发展，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科教文化等优势日益凸显，各种有利因素加速聚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特别是近几年，省委、省政府明确了推进“一化三基”、加快富民强省的战略思路，作出了“一化”带“三化”、加速“两个转变”、加强“三个基础”、建设“三个强省”、守住“四条底线”、建设创新型湖南等一系列重大部署，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增长加速、效益提高、结构优化、活力增强、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的良好态势，谱写了富民强省的喜人开篇。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湖南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要实现在中部率先崛起，仍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仍存在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工业化水平较低，城市群对区域经济的带动和辐射能力不强，资源能源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严重，人口多、投资强度不高，等等。面对中部各省争先崛起的发展态势，与任何时候相比，湖南发展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责任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对此，我们务必找准突破口，扭住着力点，争取主动权，加速新跨越。从湖南的历史使命、现实基础和发展前

景来看，要实现跨越发展和在中部率先崛起，就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认识，抢抓“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国内外产业转移等难得机遇，继续深入推进“一化三基”战略，全面推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努力在国家新一轮经济整合中赢得主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代湖南的崛起大业，需要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一直以来，饱受“自强不息、经世致用、敢为人先”湖湘文化熏陶的三湘学人，充分发挥自身的科研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引智出力，为湖南的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以中南大学陈晓红教授为主要负责人的湖南经济问题研究中心、中部崛起战略研究中心，就中部崛起战略、湖南崛起途径、湖南新型工业化等事关区域发展全局的许多重大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颇丰。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之余，费时数载，深入粤、苏、浙、鲁等沿海发达省份调研改革发展的先进经验，远涉西部、东北地区实地探究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成功实践，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湖南实际，进行全面系统的对比分析和理论总结，最终形成了包括《山东发展之路与湖南崛起》、《江苏发展之路与湖南崛起》、《浙江发展之路与湖南崛起》、《广东发展之路与湖南崛起》、《东北振兴之路与湖南崛起》、《西北开发之路与湖南崛起》等6部著作在内的《湖南崛起之路研究》丛书。这一系列研究成果的付梓刊行，我由衷地表示热烈祝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相信，此套丛书的出版，必将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给广大经济管理工作以理论的借鉴，让所有关注湖南崛起的各界人士得到深刻的启迪。

是为序。

2008年11月12日

前言

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经济全球化风起云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为增强以科技和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世界各国的竞争日趋激烈。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为内涵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形成了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可喜发展格局，各地根据自身的资源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成绩和众多的经验，如广东的东莞发展之路、浙江的温州发展之路、江苏的苏南模式、山东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同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西部地区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等，无不具有典型的意义。

湖南作为中部地区省份，和全国各地一样，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经济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和国内其他地区相比，仍具有较大的差距，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湖南要实现富民强省的目标，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好长

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工作。其关键之一是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改革提供发展动力，开放带来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和机会。还有更重要的是发展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湖南应借鉴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和本省实际情况相结合，定能使湖南经济更加又好又快发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为此，中南大学商学院湖南经济问题研究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对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发达省份的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结其发展经验，对湖南经济发展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形成了《湖南崛起之路研究》丛书。作为主编者，如果此套丛书能够为各级政府决策提供一点思路、让经济管理工作得到一些启示、为关心湖南经济发展的人们拓展一下视野，进而为湖南崛起于中部做出些许贡献，就是最有价值的回报和对我们极大的欣慰。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08年8月8日于中南大学商学院



Part One | 现状篇

- 1 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回顾**
 - 1.1 改革开放前浙江的经济发展状况
 - 1.2 改革开放过程中浙江的发展进程
- 2 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及湘浙对比**
 - 2.1 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 2.2 湖南与浙江主要经济指标的对比



Part Two | 借鉴篇

- 3 浙江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及启示**
 - 3.1 浙江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路径
 - 3.2 浙江产业集群的现状特点
 - 3.3 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启示

001

002

002

005

013

013

021

025

026

026

034

054

060

4 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及启示

060

4.1 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065

4.2 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及特点

075

4.3 浙江民营经济的启示

087

5 浙江对外开放模式及其启示

087

5.1 浙江对外开放现状

097

5.2 浙江对外开放模式

101

5.3 浙江对外开放的启示

111

6 浙江政府管理模式及启示

111

6.1 浙江创新政府管理模式的探索

125

6.2 浙江改革政府管理模式的基本思路

131

Part Three | 对策篇



132

7 立足湖南比较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132

7.1 明确湖南产业定位，突出产业发展重点

142

7.2 大力发展产业集群

153

7.3 推进新型工业化

8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富民强省	163
8.1 民营经济在实现富民强省中的地位和作用	163
8.2 湖南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对策	164
9 内外结合，促进湖南又好又快发展	176
9.1 进一步扩大湖南对外开放	176
9.2 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182
9.3 加强“3+5”城市群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194
参考文献	199
后记	203

现状篇



- 1 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回顾
- 2 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及湘浙对比

浙江社会经济 发展的历史回顾



1.1 改革开放前浙江的经济发展状况

1. 历史上的浙江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积储深厚。从考古资料看，早在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建德人”在今天的浙江西部山区一带活动。到了距今六七千年至四五千年间，浙江境内人类活动的范围已相当广泛，先民们在这里劳动生息、开辟草莱、改造自然。全省境内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百处以上，分别属于河姆文化（距今6000~7000年）、马家浜文化（距今5000~6000年）和良渚文化（距今4000~5000年）。在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种类齐全的骨、石、陶、木制成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大量保存完好的古代稻谷，榫卯结构清楚的木构件，以及色彩鲜艳的漆碗，依然能吹出动听音响的原始骨哨等，表明了这片土地早在七千多年前，就已经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史前文明；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浙江分属吴、越两国。以会稽（今绍兴）为都城的越国，在越王勾践时期曾经相当富强。秦朝（前221—前206年）在浙江设置了会稽郡。三国时期（220—280年），浙江富阳人孙权建立了吴国。公元10世纪初，浙江临安人钱镠建立吴越国，以今杭州为都城。南宋王朝（1127—1279年）建都临安（今杭州）150余年。元代（1206—1368年）浙江属江浙行中

书省。明朝时（1368—1644年）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辖杭、嘉、湖、宁、绍、台、衢、金、严、温、处11府，1州（安吉州），75县，省界区域基本定型。清朝（1616—1911年）初期地方行政承袭明朝，康熙（1661—1722年在位）初年始为省，浙江省的建置至此大体确定。

浙江经济开发较早。早在东汉时期（25—220年），浙江就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煮盐业、制瓷业也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公元3世纪以后，浙江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商业也日渐繁荣。到了隋唐时期（581—907年），浙江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农业产量大有提高，杭州、嘉兴地区成了中国江南重要的粮食产地；同时，丝织、瓷器、造纸等手工业生产发达，商品货币经济活跃，明州（今宁波）成为当时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贸易港口。公元10世纪以后，浙江进入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成为当时中国的富庶地区之一。农业生产上不仅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而且经济作物的种类和种植面积有所扩大。丝织、制瓷、造纸、印刷和造船业等已居当时中国的领先地位。商业性集镇纷纷兴起，海外贸易不断扩大，丝绸、茶叶、瓷器是当时输出的主要商品。现在的宁波、温州，是当时中国东南部进行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海上航运可达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浙江与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发展迟缓。直至1949年5月，浙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迎来了新生，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2. 计划经济时代的浙江

改革开放前浙江的具体状况同全国其他地方并无明显不同，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界定当时浙江的各种社会基本特征。首先，改革开放前的浙江经济就其本质而言是国家控制下的计划经济。在这

种经济模式下，一个企业的原材料购买、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产品销售都是由国家计划安排好的，企业是没有经营自主权的。同样农民也是在集体的安排下劳动，没有劳动的自主权，每天早上出工，晚上收工，根本就不准从事任何家庭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劳动权的丧失当然就不可能存在以市场为中心的交换经济了，自由交换经济的消失直接导致了商业在浙江的绝迹。

其次，整个浙江的社会结构大致可分为官员、工人、农民三个阶层。官员由于掌握着较多的政治资源以及支配经济资源的权力，显然处于社会的较高地位。而工人、农民则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显得泾渭分明，通常来说，因为工人是吃皇粮的，收入相对高一些，生活保障比较稳定，当时的农民对工人充满了羡慕之情。再次，当时浙江的劳动力是国家严格控制下，以非自由流动、非自由劳动、各种人身权利严重依赖于政府为基本特征。不论是官员、工人或农民，都是处于国家的严格控制管理之下，工人与农民都被国家强制固定在原籍地，他们的流动、迁移都是由国家安排控制管理的，农民无疑处于社会的较低地位，那时候的浙江农村经济实质上是国家控制下的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在这种体制下，每个农民都隶属于某一个生产大队，每个生产大队一般都会有一块固定的田地。生产大队的成员们天亮一起出工，共同在田地里劳动，最后一起收工。生产大队会按每人出工情况给予不同的工分，每人工分的统计数就成为分配收入的依据，每个农民都过着类似军营的生活。由于一切劳动所得都归集体，而集体却很难把个人的努力同其他人明显区别开来，在这种情形下，一些人就会暗中偷懒，磨磨蹭蹭，另外一些人虽能老实地劳作，但也没有因素刺激他们把聪明才智发挥出来，因而积极性很差。可见这种集体体制的整体经济效率是相当低下的，再加上浙江人多地少，耕地面积十分有限，因此当时浙江省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很低的，农村经济相当落后。改革开放前给浙江

农民的最大的印象大概就是一个“饿”字，粮食不够吃，整天饿得慌。但农民处境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农民们既没有自由劳动的权利，也没有清晰的财产权界定以及自由流动的权利。而这一切之所以存在的基础就是由于国家的严格控制，其合理性的理论基础是公有制经济的先进性。现在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改革开放前的浙江是以国家严格控制下的计划经济为主导，社会结构分为官员、工人、农民三个阶层和非自由劳动、非自由流动、各种人身权利严重依赖于政府为基本特征的。

1978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居全国第十四位，而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2 改革开放过程中浙江的发展进程

1979—1997年，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6%，比同期全国年均增长率高出3.8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实现翻三番，经济总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全国第十四位跃居全国第四位，仅次于广东、江苏和山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0 515元，也居全国第四位。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位居全国第二位，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位居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位居全国第二位。浙江经济最大的特点是民营经济，在全省GDP值中所占的比例占主导地位，全省大概占70%~80%，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90%。国企改革总不见成效，浙江经济却没让国家费什么事就发展得很好，还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现在全国各地下岗问题比较严重，而浙江的下岗问题并不严重，特别是温州一带没有下岗职工，那里不叫下岗叫转岗，而且似乎都很正常。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快、规模大，员工收入很高。浙江有钱的人太多了，在温州百万富翁是很一般的，很多都是千万富翁，还有不少甚至是亿万富翁。浙江居民存贷款比

例在全国也是很高的，存款大于贷款，每家银行的总行会把浙江支行的存款调剂到其他地方去放贷。

浙江市场化程度高，民营经济发达。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一对孪生兄弟，是相得益彰的。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只有市场经济发展了，才能有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两者可以非常好地结合在一起。浙江的经济发展是民间推动型，是老百姓自己干起来的，是从很小的生意做起的，从挑着担子“鸡毛换糖”开始。在浙江，这些往外走的农民大都是能工巧匠，他们都有专业化分工，而且在某些小商品和产品的制造上各有传统经济的支撑。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农民很容易学会，转行快，所以很容易吸纳就业，形成市场。如绍兴倚借“日出华舍万丈绸”的传统经济，日后大力发展轻纺工业；宁波依托“奉帮裁缝”的传统技艺，日后大力发展服装产业；永康利用“百工之乡”的优势，日后大力发展小五金；温州人发挥肯钻研、善模仿、能吃苦、会经商的精神，大力发展具有鲜明特色的皮鞋、服装、打火机、眼镜、灯具、纽扣、低压电器、标牌徽章、编织等小商品。

浙江经济是靠专业市场建设推动的。浙江有几千个专业市场，这些市场的规模都非常大，小的有几十个亿，大的则有几百个亿。它们在全国专业化市场当中所占的市场份额比重都很大，这说明浙江的专业市场已经大面积向外辐射，已经具备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加工能力，而且营销还形成了网络化，其他地方已经没办法和它竞争。星罗棋布的商品市场和配套成龙的服务体系成为支撑整个20世纪80年代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并推动着浙江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由一个处于中下水平的传统农业省份，一跃成为以现代工业为主的经济大省。在温州，从早期的比较原始的专业市场，一直发展到现在用现代市场理念来运作的市场，人们逐渐用比较现代的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方式去替代传统的交易方式，过去是现金

交易，背着一麻袋的钱去交换货物，现在逐步由电子汇款等现代化支付手段所取代。像温州这样由传统的专业市场已经转型的还有不少，如义乌，一些专业户现在已是生产、销售一条龙了，而且主要精力放在生产上。因为他们通过在这个小商品市场几年或者十几年的经营，已经形成了多种销售网络和渠道，不用担心商品销不出去了，可以自己办厂生产产品来卖，不必像过去那样从其他地方批发这些东西到这里来卖，这实际上就是市场促进了工业发展。

在许多人眼里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一个谜。浙江省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是除了宁夏、台湾及海南外全国面积最小的省份，其中山地和丘陵占70.4%，平原和河谷盆地占23.2%，河流和湖泊占6.4%，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人均耕地面积为0.57亩，低于全国1.2亩的人均耕地面积水平，不及全国人均耕地占有量的一半。矿产、能源比较贫乏，在全国“各省市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中浙江排行倒数第三。浙江人最苦的时候是改革开放前后的那几年，人们纷纷出去打工。浙江在起步的时候比江西穷，以前有很多浙江人在江西打工，很多苦力活都是浙江人在做。“文化大革命”后期江西驱赶外流，主要就是那些在全国到处被打击、被赶得到处跑的浙江人。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浙江省的投资很少，“一五”时期的投资额仅占全国投资总额的0.84%，直至1978年，浙江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54.3亿元，仅占全国的1.6%，以人口平均计算，列全国各个省份的最后一位。处于前线位置的温州更是少得可怜，从1949年到1981年，国家在此的固定资产投资总共为6.55亿元，平均每年只有0.2亿元。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的工业生产在资源型和投资型方面显得相当薄弱，浙江经济在资源与体制的双重约束下，不可避免地陷于困境。浙江处于计划经济的边际地位，由杭嘉湖平原地区到山岭纵横的温州地区，政治体制影响由较强到极弱递减。现在浙江民营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在起始阶段更像是某种